

迎接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 重提“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林培源

青年写作要真正发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定是同时在题材和手法,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用心经营和创造,在题材上,既要凸显地方性,同时又要放眼世界,兼顾全球性

“题材”和“写法”,也即“内容”和“形式”是文学创作中老生常谈的话题,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在上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时期,茅盾和瞿秋白就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讨论的导火索,是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创刊号”,1932年6月)针对“写什么东西?”的问题,指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利用旧的形式优点”:

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优点……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

说书式的小说可以普及到不识字的群众,这对于革命文艺是很重要的。有头有脑的叙述,——不象新文艺那样“颠颠倒倒无头无脑”的写法,——也是现在的群众最容易了解的。

瞿秋白这里强调的是文艺的普及面向,也就是为了照顾普罗大众的阅读习惯,创作时要借鉴旧式的文艺手法,用口语化且浅近的叙述方法,尤其是要摆脱五四文学欧化的叙事倾向,只有用“有头有脑的叙述”(也就是善于使用起承转合的线性叙事)才能让普通群众易于接受。

与此相对,茅盾则认为将新文学跑不进大众归咎为文字本身(即瞿秋白说的“新文言”)的看法有失偏颇,因此主张新文学须借重旧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水浒传》等)“动作多,抽象的叙述少”的描写方法才能接近大众。

两者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分歧在于“怎么写”——瞿秋白的重点落在语言上,茅盾的重点落在叙述技巧上,但殊途同归,二者都对古典文学资源有所借鉴,都强调要从“旧式的大众文艺”、“旧小说”身上汲取养分,只不过侧重点有区别罢了。

这场讨论尽管发生在90多年前,但对我们思考新时代背景下青年文学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仍

有启发性。

以近几年比较火热的“新东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写作”为例。二者都是以中青年作家为主体,它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各有千秋。从题材上也就是“写什么”来看,“新东北作家群”具有相对可以辨析的面目,比如班宇、双雪涛、郑执、杨知寒等人时常从“子一代”观察“父一代”,题材上多围绕90年代下岗潮,并深入共和国的历史,比如双雪涛的《光明堂》,虽然用了一个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结尾——主人公双双掉入冰湖中,在幻觉里见到“文革”的历史,但总体而言,小说的底色还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带有一定的“新伤痕”文学的特征。

近年来,新东北作家群呈现转型的趋势,逐渐要摆脱题材的束缚,拓宽写作的范畴,比如班宇在《缓步》里就不再执着于《冬泳》里那样去写下岗潮,甚至写起了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双雪涛更不用说了,在新作《不间断的人》里甚至借鉴类型文学如科幻小说的元素试图革新自己的写作。

相比之下,我觉得“新南方写作”自从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和文学现象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尽管学者们从文学地理、方言的使用、海洋性、临界性等五花八门的观念上对“新南方写作”进行界定,但“新南方写作”之所以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被凸显出来,正在于其野蛮生长和杂花生花的特质。因此,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新南方写作”相比于“新东北文学”或者说“新东北作家群”,显得更加驳杂、宽泛,比如广西籍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就将辞典作为方法,在小说中谈到地方性和流动性、世界性的问题;潮汕籍作家厚圃在长篇小说《拖神》里借鉴潮汕民俗活动,让潮汕老爷开口说话,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与历史小说进行融合,大开大阖,充满史诗气质。

此外,“80后”作家林棹的《潮汐图》无疑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做了很好的示范,比如她将触角伸向19世纪末东西方交汇、碰撞的历史深处,写一只虚构的巨蛙在广州十三行、殖民地澳门和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三者间游历的故事,并且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大面积、高密度地使用粤语方言,造成一种叙述的奇怪和陌生化效果。这种写作方式是具有典范性的。

再比如“90后”的长篇小说《撞空》,写的是疫情前后的广州城市生活,以广漂青年何小流的经历为线索,用的是一种向城市肌理的纵深开掘,并且将现代主义比如意识流、深描等融合其中的写法,他写出了我们几乎从未在当代文学中看到的充满烟火气和市民性的广州,结尾部分主人公寄居在花城汇的地方,像边缘人、流浪汉一样的生活,非常震撼,带有强烈的荒诞现实主义的气息。此外,王威廉、陈崇正等青年作家也在现实主义传统和科幻类型领域游走,他们拓宽了湾区青年写作的题材、形式等面向,使得“新南方写作”变成了“在南方”的“新”的“写作”。

总的来说,“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青年写作要真正发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定是同时在题材和手法上。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用心经营和创造,在题材上,既要凸显地方性,同时又要放眼世界,兼顾全球性。陈崇正的小说《归潮》写女主人公林阿娥带着女儿林雨果从泰国穿越边境回到潮汕的历险,就很有这一特点;在写作手法上,要努力凸显现实性同时兼顾实验性或者说先锋性,比如潮汕籍青年作家陈润庭最新出版的小说集《超级玛丽历险记》就带有很强的实验色彩,将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融入小说中,同时又凸显了身为岭南、潮汕作者对本土文化和人物的现实生活的关注,彰显出青年文学的新力量。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青年教师)

文学名刊 主编谈



文学批评新人的培养需要勇于突破各种局限,真正唤醒文学批评的活力和生命力。这是文学研究期刊义不容辞的责任

## 真正唤醒文学批评的活力和生命力

□韩春燕

文学研究期刊是推动文学批评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之一。《当代作家评论》自1984年创刊以来,始终与当代文学批评休戚与共,推动或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尤其是当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可以说,《当代作家评论》已经与当代文学深度融合,它的总体性目标就是不断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为此,《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了一系列特色栏目,并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但是,这一总体性目标的设立和阐释需要随着历史语境和文学诉求的变化而不断调试。近年来,当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当代作家评论》也对此做出了及时而有效的回应。

从2022年开始,杂志开设“东北文艺复兴”专栏。此专栏的设立一方面基于国家全面振兴东北战略的顶层设计,东北文艺及其研究必须为此提供文化支撑和思想动力。这是当下东北现实境况对《当代作家评论》提出的要求,也是《当代作家评论》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是东北文艺在近几年的火热,引起了学界的集体关注,其中囊括了文学与新媒体、当代文学的地方性与中国性和世界性、文学与经济改革等诸多学术议题,且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因此,《当代作家评论》以“东北文艺复兴”为讨论核心,对东北当代历史及其文学写作传统,以及东北与中国乃至在世界中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整体反思,并由此引向一个根底性问题:何为“当代”以及文学如何讲述“当代”。在此基础上,“东北文艺复兴”专栏调整为“新东北·新南方”专栏,继续讨论地方性写作潮流的现状和未来。难能可贵是,“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入选2022年度“中国文学十大热点”,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当代作家评论》推动的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思潮和学术事件。

除了引领学术话题,助力当代作家成长也是《当代作家评论》的重要传统和推动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路径。从2023年开始,《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专栏,主要目的是对整体性、系统性和自主性小说理论的当代作家的小说理论进行阐释,以此构建中国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在文学批评界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而且,专栏在刊发相关文章时,一篇为作家对自我小说理论的自述、一篇为批评家针对作家小说理论中的某一关键要素的评述、一篇为批评家对作家小说理论的整体阐释,这就形成从一位作家到一个要素,再到一个整体的有机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专栏把焦点集中到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群体上,让他们的小说理论及其解释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专栏开设至今,已取得学界的认同,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同时,多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参与其中,与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就此话题展开对话。一批青年作家和批评家从中获益,得以成长。

《当代作家评论》作为国内唯一以作家作品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文学研究期刊,深知文学批评家对推动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文学批评新人的涌现,但也体会到其中存在的种种局限和壁垒,尤其是仍有一些秉持文学批评理想和文学批评才华的青年人被诸多因素钳制,无法走向文学批评前台。因此,文学批评新人的培养需要勇于突破各种局限,真正唤醒文学批评的活力和生命力。这是文学研究期刊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当代作家评论》近期推出“新时代文学批评新人培育计划”,每年在海内外遴选5—10名年龄在40周岁以内的文学批评新人,而且不注重学历背景、学术经历和学界人脉,提倡独立性和个性化的文风,真正挖掘出有批评才华的青年人,充实到文学批评队伍中。这一举措刚刚推出就引发了学界强烈反响,一些文学批评大家纷纷表达赞誉,认为这是有担当、有责任和有勇气的行为。同时,一些青年学者踊跃报名,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报名人数近50余人,其中包括一些已经得到学界认同的青年文学批评家。这既在杂志的预料之中,也在预料之外,足以说明学界对文学批评新人的强烈渴求。实际上,《当代作家评论》在此之前就已经为中文专业的在读博士生开通投稿绿色通道,积极刊发博士生的文章。

文学批评的发展要适“事”而发,更要适“时”而动。前者针对的是文学场域包含的全部内容,后者则指向文学批评发展的时代环境。具体而言,数字时代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文学研究期刊作为刊发和传播文学批评的主要载体也要顺势而为,实现数字化转型。《当代作家评论》在这方面做出积极尝试,主动谋求数字化发展,开设了“云上风华”栏目,定期要求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相聚云端,共同讨论文学话题。首期讨论了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并以短视频的方式在网络传播,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当代作家评论》还在微信、小红书等新媒体上开设视频公众号,定期发布学术工作坊视频、作家创作谈、批评家说等内容。《当代作家评论》联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重写和再写文学史”工作坊的视频内容近期也在微信视频号和小红书上发布。总之,我们尝试通过数字化发展,为文学批评的大众化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法。

上述举措属于《当代作家评论》为推动文学批评发展提供的创新之路,但“创新”的前提一定是“守正”,必须坚守和延续杂志的传统。《当代作家评论》是以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为主体的杂志,因此要始终维护好这块阵地和这一品牌,但也要为其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为此,《当代作家评论》更为强调作家作品的“新”,一是作家的面孔要新,主要指被文坛忽略或初入文坛,但展现出强劲的文学创作实力的作家;二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要新,主要指叙述内容要有突破、表述形式要独特;三是作品要反映新时代的文化思想诉求,主要是作品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要新;四是要在文学经典中发现新内容、新思想和新审美。基于此,《当代作家评论》长期开设“当代文学观察”“当代文学再评价”“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专栏,并取得良好反响。“当代文学观察”栏目曾以组稿的形式讨论“当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同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全部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充分表明《当代作家评论》在推动文学批评发展道路上的探索是有效的。

《当代作家评论》作为文学研究期刊的一份子,为推动文学批评发展所做出的诸多探索只是其他文学研究期刊为此共同努力的一个微小缩影。我们能做的就是时刻牢记文学批评的初心,坚实走好每一步,为文学批评的繁荣贡献力量。

(作者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 从容描摹人生的浪花

——读喻之之小说集《忧伤的夏小姐》

□刘川鄂

敦煌文艺出版社今年初推出武汉作家喻之之的中短篇小说集《忧伤的夏小姐》,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8部。初读小说集《忧伤的夏小姐》时,脑子里冒出几个印象:凡人悲欢、情感聚焦、奇幻情节、极境拷问、事理推演、轻灵柔和、从容舒缓的节奏。她静观默察生活的酸甜苦辣、精心提炼虚构凡俗的生活,从环境际、偶然必然、演进反转等方面,力图丝丝入扣地深描,琢磨人物的性人性量。

喻之之选材广泛,聚焦都市男女尤其是年轻人的情感世界,探寻人生的意义,运用不同的叙述风格驾驭不同题材,有底层书写、乡土情怀、市井生活、校园日常,等等。《十一分爱》折射了现代都市女性的精神困境,《王昆明的拖鞋》描写了中学校长王昆明献身于山区教育的人生经历,《没有蔷薇的原野》讲述了乡村女教师苏璞对乡村儿童的关爱和对乡村风景的迷恋,《开往仰山小镇的顺风车》叙述了两位坐顺风车的同事间的暧昧情愫,以及突如其来的灵魂拷问,《忧伤的夏小姐》通过对夏小姐爱情心理的剖析,展现了社会环境的变迁对于女性内在精神世界的冲击。

在某些题材上,作家显示出轻车熟路的娴熟叙事,在有趣味的故事中展现人生的底色、人性的本质与变异。其人物刻画从饮食男女逐步走向更为开阔的社会人生,并在广泛取材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挖掘,折射出时代洪流外具体而微的细小生活、复杂人性与情感百态。作品中的人物显示出与武汉的精神血脉联系,他们散发着热力、不屈,也充满迷茫、困惑,这是最贴近世俗的、本真的人生状态。武汉的不同侧面,也构成了人生的复调。出租屋、阁楼与大饭店、画廊、书院、茶楼、校园,这是一些公共空间,也是开放空间,更是个人化的空间,可以说有点书生气、有一点小资气,也有点浪漫情调,隐含着作者对于都市文学的一种新理解,对于都市人生的一种肯定。

作家对叙述的把控较为张弛有度。时距上,既有十年如一梦的压缩,也有一夜山洪的细节展开。书中的气象描写与人物描写相得益彰,频频出现的季节及天气氤氲着情感氛围,对作品的主题、人物或事件产生映射作用,并构成隐喻,例如雨天与暧昧蔓延的适配度(《四月的牙齿》),酷暑与苏璞矛盾心理的相衬(《没有蔷薇的原野》),暴雨则使人物命运充满了悲剧感(《棠树棠树》)。雷克夫认为:“譬喻不只是语言问题,也是概念结构问题,而概念结构也不只是智能问题,而是涉及所有经验自然:色彩、形状、质地、声音等。这些范围所建构的,不只是俗经验,也是审美经验。”作品中的气象描写,乃至文中的各类譬喻,不仅展现了世俗体验,更代表了审美经验,彰显出美学价值。当然,在某些场景的衔接方面,还可以更加从容,铺垫更加细致。

按代际划分来看,喻之之的创作属于“80后”写作。稍有不同的是,她跳出以往商业化、时尚化、娱乐化的惯用套路,将目光聚集在实实在在的土地、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复杂幽微的情感上,从小的切口出发,描摹被宏大叙事淹没的人世浪花,这一片一片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浪花,却是普通人结结实实、真真正正的生活情状。喻之之笔下的凡俗情感、极境拷问、舒柔叙事、罗曼审美,已经构成了鲜明的特色,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她曾提到文学的真正功能应该是深层疗愈。在唤起读者对真实生活的感受力、敏感度、思考性的同时,她还可以开拓更为广阔的言说空间,剖析现代人的精神、心理张力,书写底层人民更立体的生活面貌,并触摸历史文化的脉动,为作品增厚度、添底蕴,也为文学界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评论

## 『消逝的风景』依然可以活在我们心中

□张守涛

最近,学者丁帆出版了新书《消逝的风景》,书写了南京那些消逝的风景。不同于一般描写南京风景的著作,这本随笔集有着鲜明特色和重要价值。首先,本书注重对南京风景的描写。其所谓的“风景”是广义的风景,包含了自然意义上的风景和历史意义上的风情、风俗。如作者在书的引子里所说:“无疑,我眼里的风景是一种广义的风景,它包括风情、风俗画面,当然也包括风景中的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南京的风景“地图”,也是一部南京的历史文化“版图”。如其中生动描绘了南京历史上市井风俗构成的街头风景、老字号澡堂子的风俗画面,以及夫子庙上上世纪50年代末“半旧半新的民国风情韵味”等。作者近年来的散文随笔由人物描写转向风景描写,以“追寻风景背后人文意识中所包含的历史况味和现实意义”,本书可谓作者风景描写的代表作。

其次,这本书有着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作者两岁多就生活在南京,七十多年来,对南京历史文化变迁、地貌风貌变化等非常熟悉,对南京也有着强烈的感情,如书中所言:“因为作家和艺术家所看到的一切过往的生活风景,都饱含着人类对历史和人性的价值定位,作品的不朽是与之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这种强烈的主体性叙事使得“消逝的风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可谓“个体的成长与城市的成长两种‘书写’交互”。

丁帆是学者,也是作家,兼有学理与文采,也因此使得本书具有较强的深度和可读性。尤其是本书认为南京那些消逝的风景是中国原始自然风景、农耕文明风景、工业文明风景和现代文明风景的交叠变迁,并探究了这“四叠记”风景变迁的影响,对社会变迁、现代性、人生意象等有很多深入思考。其语言也非常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如书中“致敬”了鲁迅名篇《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写法。

“我只希望从不同时代的眼睛折射中翻拍出历史细节的碎片,尽量用白描的写法,而非文学修饰的手法,去冲洗出我所看到的那时南京生活风景和市井风情风情的底片。”如作者所言,本书驾轻就熟地采用“电影眼睛”的独特书写方式,不仅带领读者领略了新街口、夫子庙、鸡鸣寺、茶楼、戏院、澡堂等南京风景变迁,更打通生活、历史、文化,让我们了解、体味到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思想,“让读者在散步般轻松的阅读中汲取了大量知识,对生活的新旧、时代的纷繁发展、地理意义上令人迷惘又新鲜的多样色彩有新的感触。”

因为以上特色,《消逝的风景》不仅对于作者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特别是城市风景作品创作也有着重要价值。如作者所言,“‘精神谱系’才是最重要的城市价值资源”,该书书写了南京的“精神谱系”,对挖掘、弘扬南京历史文化及丰富城市价值资源也有着一定意义。另外,南京作为“十朝古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南京的历史文化变迁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剪影之一,甚至是代表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消逝的风景》书写的不仅仅是南京“消逝的风景”,而是我们整个中国“消逝的风景”。那些风景虽然消逝了,但通过本书的描写依然可以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历史文化中,这也是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

(作者系文史作家)



《消逝的风景》,丁帆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